

法国与无援未成年难民问题

——基于人道主义的视角

蒋澈 严双伍

【摘要】欧洲的难民问题不断吸引着媒体的注意力，有关的研究也有不少问世。但难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无援未成年难民却甚少引起关注。与一般难民相比较无援未成年人的状况更为困难，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法国相关法律在认定他们的双重身份——既是难民又是未成年人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使他们在漫长的甄别过程中无法享受未成年人的应有权利。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这一状况理应尽快得到改变。

【关键词】法国移民管理 无援未成年难民 甄别与安置

一、欧洲的难民问题

欧洲是近代以来难民问题多发的地区之一。如果说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移民的主要类型是欧洲的外迁移民，特别是跨越大西洋迁往新大陆的海外移民的话，那么，20 世纪上半叶以来的欧洲移民的主要类型不再是外迁移民，而是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难民。

战争难民在一战期间就已经显现出来，但一战后的欧洲难民问题更加严重。此时欧洲难民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战后回迁至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约有 200 万人。据德国统计局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调查，超过 100 万民众从其他国家回迁到了德国，其中大约有 8 万民众是从波兰返回德国的。^①二是因俄国十月革命、战争与饥荒等引发的大规模难民潮。1917-1921 年，有近 150 万俄国人逃往欧洲各国，其中约有 8 万人在当时的国际联盟难民署(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的协调下成为无国籍人士。

此后，国际联盟难民署协调处理了包括“亚美尼亚大屠杀”、1923 年希腊与土耳其人口互换等造成的大规模国际难民安置问题。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

^① Klaus, Bade, and Jochen Oltmer. *Normal fall Migration*, Bonifatius Druck Buck Verlage, 2002, p.33-34.

和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导致欧洲难民数量大幅上升，同盟国为解决难民问题在联合国正式成立前便设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简称 UNRRA)，^①由该机构负责协调难民问题的国际合作。据估计，整个二战期间共产生了五六千万难民（当时欧洲总人口也才五六亿）。到 1945 年 5 月，欧洲还约有四千万人无家可归。^②冷战时期，世界虽然总体处于和平状态，但依旧不安宁，局部战争与冲突从未停止过，例如阿尔及利亚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内战、阿尔巴尼亚动乱等，也产生了不少难民。

自 2015 年起，由叙利亚内战等引发的西亚北非地区的持久而剧烈的动荡，导致数百万难民不顾生命危险，纷纷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逃离本国，前往欧洲国家避难。据有关测算 2015 年抵达欧洲的难民高达 130 多万。目前这一局势稍有缓和，2017 年寻求欧洲避难的难民为 70 万。这场前所未有的难民潮，对当时正处在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盟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压力。虽然目前难民人数开始减少，但难民带来的诸多问题并没有缓解。

与过去相比较，此次难民危机具有若干新的特点，其难民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冲击强度之猛烈，前所未有：1. 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此次难民潮发生地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其中西亚地区更为突出。根据联合国难民署 2015 年 6 月发布的年度报告《战乱世界：全球难民趋势》，2014 年的一千多万国际难民中，超过一半（53%）来自于叙利亚（388 万）、阿富汗（259 万）与索马里（111 万）；2. 欧盟国家成为难民避难的集中目的地。原因在于：一是地缘因素，因为地理位置上的原因，对西亚和北非的难民来说，移民欧洲的路线较近，所用时间短、所需费用少；二是难民避难传统，西亚北非的难民历史上就有移居欧洲国家的传统；三是欧洲地区接纳难民的文化和传统；四是欧洲国家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环境一般要优于难民产生国家。

难民进入欧洲的路径一般是从东欧到波兰，从巴尔干到希腊和保加利亚，从非洲之角、荒漠草原和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到意大利和西班牙，还有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到罗马尼亚等，他们到了目的地后就会分散到法国、英国、德国等其他欧盟国家。难民对目的地国家进行选择时，一般会有以下几点考虑：该国的经济状况如何、该国对非法工作的调查是否严苛、所在国语言是否跟难民学过的语言有关、难民们有没有亲属在某个国家等待他们，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综合斟酌来决定前往哪个国家。

二、法国本土的移民管理

法国现代移民的概念出现在 19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对外战争，刺激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民族主义强调本国的语言、习俗、历史与宗教的重要性。

^① 王德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诞生及其使命》，载《世界历史》2004 年第 5 期，40 页。

^② 联合国难民署：《2000 年世界难民状况》。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13 页。

对法国来说,最初的移民来自邻国——德国和比利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重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导致向法国移民的国家增多范围扩大,如意大利和波兰等,这些国家都纷纷开始向法国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劳动力需求使向法国移民的国家范围又经历了一次扩大,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南斯拉夫、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和一些撒哈拉以南国家。法国政府当时认为,移民是属于短暂性质的临时现象,但是没有意识到人们在法国生活了几年后可能就不想离开了。随着外来人口居住时间的延长,法国移民管理就出现了。法国政府开始出台一些管制的政策,部分原本合法的移民因为这些政策的限制,突然一下子变成了非法的移民。不过当时移民的非法身份并不会维系太久,一是因为政策刚刚出台,实际上没有严格执行,政策本身也不过于严苛;二是法国政府没有太看重移民问题,反而由于劳动力需求等因素更愿意让非法难民待在国内。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恶化和社会问题加剧,法国的移民、难民政策不断严格起来,导致一些新概念的出现和新的难民政策的出台。

1972年,法国在 Marcellin-Fontanet^①通报中针对难民问题发明了一个新的词语——“无证件者”(Sans-papiers)。通报强调合法移民的身份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是自己的工作要合法(要纳税),第二是居住的房子要符合国家的标准(面积大小等)。不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则属于无证件(或证件不全)的非法移民。

2000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无证件工作者”(Travailleurs sans-papiers)。这是指一些有合法工作的人,不过他们利用的身份是假的(或者不是自己的)。一些工会组织曾试图利用这个身份强调并且证明无证件工作者具有入乡随俗的能力,是法国所需要的劳动力。不过他们的意图失败了,管理当局只强调他们是无证件的工作者,并不看重他们入乡随俗的生活能力,所以这类人仍然是非法的居留者。

2016年在法国的“无证件者”至少有30万人(众议院报告273号)。这个数字只计算受到AME(Aide médicale de l'état: 政府医疗保险^②)帮助的无证件者,所以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因为不是所有的无证件者都享受到这项帮助)。

无证件者大多数的情况都比较复杂。首先,他们一到法国就要去OFPRO(Office français de protection des réfugiés et apatrides: 法国难民与无国籍者保护局)申请国际保险。法国难民与无国籍保护局的任务是判断无证件者的情况是否符合要求避难的条件。按照法国难民与无国籍保护局2016年的报告,只有28.8%的难民被接受。被接受的难民可以合法地待在法国十年,并且享有和普通法国人一样享有的任何权利(不包括选举投票)。而被拒绝的难民的身份就变成OQTF(Obligation de quitte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 必须离开法国的人),这些被拒绝的难民中有一部分试图移民到英国。

^① Marcellin-Fontanet: 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夏邦-德尔马(Jacques Chaban-Delmas),为应对失业增加而发布了Marcellin-Fontanet通报。

^② 政府医疗保险: 给难民提供的完整医疗保险。有签证的或者正在申请签证的人不能申请政府医疗保险。申请者必须在法国已停留至少3个月(孩子除外)。

任何在法国的无证件者都有权利享受政府医疗保险福利的帮助，理论上他们也有权利要求分配地方居住，不过实际上免费住的地方很少。问题在于无证件者不被允许自己租房子或者找工作，再加上所有未被法国难民与无国籍保护局接受的人都有被驱逐的危险，这就使得无证件者的情况特别尴尬。

未成年人（小于 18 岁）在理论上是不能给予无证件者的身份，因为这些孩子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對象。也就是说外国孩子有权利像法国孩子一样在法国居住、生活和享受免费教育。当然实际情况跟法律规定差距非常大，因为无证件父母的孩子上学的时间很难稳定（父母无法稳定地住在一个地方，还有被驱逐的危险）。

三、特殊群体：无援未成年人

无援未成年人^①的定义简单明确，是指难民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所有在法国年龄未满 18 周岁并且没有任何监护人帮助的未成年孩子，法文简称 MIE (Mineurs isolés étrangers: 无援未成年人)，亦称 MNA (Mineurs non accompagnés: 无陪护未成年人)。不过这样简单的定义其实掩盖了现实中非常复杂的情况。试问如果任何证件都没有，如何证明此人不是成年人？当然反过来如果超过十八岁的难民能够证明他们不是成年人的话，那么他们也有机会获得法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待遇。

根据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关于 MIE 的第 17 号报告，2015 年，有不少于 10 万的 MIE 请求在 75 个国家避难。在法国 2010 年有 4000 个 MIE，2016 年增加到 13000 个。数据发现这些未成年难民当中 95% 都是男生。虽然女生数量少是可能的，但 5% 的女生数据一定不准确。因为大赦国际只统计那些已经到达目的地的 MIE，而未到达目的地的 MIE 则没有计算在内。对女生来说，她们逃难的风险更高更多。她们的命运掌握在蛇头、老鸨和其他恶劣不良机构的手里，成功抵达避难国的数量也就更少。14 岁以下的 MIE 只占 14%。大多数 MIE 的年龄在 15 岁与 17 岁，16 岁的 MIE 占 47%。当然这一数字只是大致估计，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一个孩子实际是多大年龄。这个数字只包括具有有效证件并且被 ASE (Aide sociale à l'enfance: 未成年社会救助局^②) 接纳的孩子，或者被一些结果值得怀疑的测试判定为 18 岁以下的孩子。

根据 MMNA (Mission des mineurs non accompagnés: 无陪护未成年人调查团) 的统计，2015 年法国共接受了 5990 个 MIE，在 5990 个 MIE 中只有 476 个申请了避难。依据大赦国际的数据，大多数的 MIE 来自撒哈拉以南地区 (几内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布拉柴维尔刚果、马里、乍得和尼日利亚)。撒哈拉以南地区的 MIE 占总数的 61%。从亚洲来的

^① 无援未成年人：在目的国没有或者找不到成年监护人的未成年人。本文指的是无援未成年的难民，以下均简称为 MIE。

^② 未成年社会救助局：给家庭与孩子提供帮助的服务机构。目的在于保护并且保证无援未成年人的安全（提供住宿、餐饮与教育）。ASE 有权利强迫孩子离开自己的家庭跟随他们。

MIE, 有的来自阿富汗和南亚次大陆 (16%), 有的来自中东地区 (13%)。最近发生的冲突也扩大了 MIE 的来源范围, 新增了厄立特里亚、索马里、苏丹、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

很多 MIE 踏上逃亡之路的原因是战争。来自叙利亚的 MIE 大多数是为了逃避自 2011 年开始的战争 (阿萨德政府对反叛组织)。来自伊拉克的 MIE 也是想逃避战争 (尽管战事现在已经结束)。也有希望从战争和暴力行为中解脱的, 例如来自索马里的 MIE。还有其他的想逃避内战, 比如苏丹人 (因内战引发) 和阿富汗人 (被塔利班威胁)。另有一些 MIE 是想逃避专制 (厄立特里亚) 或者贫穷、腐败、暴力行为和国家不稳定 (科索沃和马里)。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逃亡原因。有的 MIE 成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希望, 父母让他们出国学习并可能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然后把一部分的收入寄回家乡。另有部分 MIE 到法国来寻找亲戚, 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有时他们找不到亲戚, 有时他们则被亲戚拒绝)。还有部分 MIE 被恶劣不良机构利用 (乞丐团伙、雏妓团伙) 所蒙骗, 只图更好一点的生活条件。

无论离开自己的国家是由何种原因所决定, 可以确定的是, MIE 的逃亡之路是漫长而痛苦的, 即使经历千辛万苦后最终到达目的地, 也并不代表问题得到了解决, 有时候到达目的地的结果就是拿到驱逐令。负责难民面试审核的官员鲁泽恩·勒贝尔 (Rozenn Le Berre), 在《解放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在一次面试审核中就有一个孩子说道: “原先我离开正常的生活, 现在我感觉没有生活可言了”。^①

难民来自许多不同的地方, 对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 无论乘坐何种交通工具, 为了到达目的地只能通过蛇头的安排。蛇头的角色不只限于把难民送到目的地, 他们也提供或真或假的证件, 并且支招这些难民如何应对面试 (许多难民在面试时描述的状况并不是自己的真实情况而是蛇头教给他们的内容), 难民希望这样做能够不被目的地国家的相关官员直接拒绝。难民给蛇头付钱了以后 (对一般的难民来说, 酬金费用几乎是他们所有的积蓄), 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蛇头手里。这个选择风险巨大, 难民并不确定他们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有时候蛇头在路途中会通过讹诈方式以赚取更多的钱财, 甚至有时候他们会被强奸或者强迫女孩子来做妓女。

蛇头也不是难民会遇到的唯一风险。路途中还有各种各样的交通风险, 也还会遇到警戒部队、海关或者腐败官吏。事实就是, 难民如果没有证件或者没有权利呆在某个地方, 那自身的身家性命和基本权利就不得不面对坏人或者罪犯的肆虐。

经历如此恐怖和痛苦的旅途后, 难民 (特别是心理更为脆弱的孩子) 会进入 “害怕” 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是带来可怕的反反复复的心理后果 (大脑不断浮现的画面和噩梦), 它会在未成年人幼小的心灵里造成严重的 “后遗症” (要尽量试图避免让大脑重复恐惧的画面或者做噩梦), 这种状态将长期逼迫他们保持精神上的警觉和防范; 其二是部分孩子增大患抑郁症的风险 (过分挂念、恐惧或者酒精毒品等成瘾)。

^① 负责难民面试的 Rozenn Le Berre 写出自己的经历, *Libération*, 2016 年 3 月 9 日。参见 <https://www.liberation.fr/apps/2016/03/mineurs-isoles-etrangers/#chapitre-1>。

四、法国如何对待 MIE

难民通过飞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或者直接步行到达法国边界内，路途遥远十分艰辛。如果难民进入边界之前没有被逮捕的话，会有一些照顾难民的非政府组织接待他们，并且为 MIE 联系合适的服务。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而在这段等待的时间内 MIE 只能依靠自己。

如果难民乘坐飞机来到边境，有可能在检查证件的时候被发现。在此情况下，难民会被逮捕并且被送进拘留室（被驱逐的风险大）。问题在于，如果被驱逐的难民未成年，那么这时就会涉及到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问题。MIE 被逮捕以后也还可以试图要求避难。

MIE 进入边界之后，首先被 ASE 接待。ASE 会把他们送到 DDAEOMI (dispositif départemental d'Accueil d'évaluation et d'orientation des mineurs isolés: 无援未成年人地区接待测试与指导机构)。按照大赦国际第 17 条的报告，85% 试图获得 MIE 接待福利的难民会被直接拒绝（即没有通过测试），也就是说只有 15% 的 MIE 能够获得相关福利待遇。这种测试主要是判断他们是否未成年，以及是否真的无援。测试包括面试和值得质疑的身体检查。身体检查有两种方法：一是检查手腕 (Greulic and Pyle)，二是检查牙齿。这类检查有点极端，有把人类当作牲畜对待之嫌疑，而且这类测试结果并不准确（一般会有 18 个月的差距）。要是 MIE 正好 16 周岁的话，保护他的法律有可能就从两年缩短到几个月，而且等到相关手续都办完可能就已经满 18 周岁了（此时又会有被放逐的风险）。

如果 MIE 被拒绝给予 OPP 许可 (Ordonnance provisoire de placement: 临时安置许可^①)，除非法官抗议，他们在司法鉴定结束后就不再享有法国法律规定的待遇福利了。司法鉴定期间，MIE 还有申诉的权力。申诉过后要等两三个月时间才能进行儿童法官的面试。面试后，难民需要做身体检查并且等待结果。结果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是再一次被拒绝（拒绝给予临时安置许可）；第二是被接受，给予临时安置许可。在最终被拒绝的结果出来之后，难民还可以向 ASE 要求避难。但如果这一次又被拒绝的话，难民还有机会再申诉一次，并且等 6 个月出结果（这是最后一个机会，90% 的人都被拒绝）。

如果 MIE 被给予 OPP 临时安置许可，他们就需要接受与儿童法官的面试（等待时间一般在 2 个月到 3 个月内）。之后他们还要通过 MIE 测试并且再等两个月才能拿到结果。如果测试判断难民是 MIE 的话，那么他就安全了（一直到 18 岁为止，部分省延长到 21 岁）。面试的时候 MIE 要介绍自己，介绍亲戚和家庭状况，并且解释在自己的国家时的生活状况，如何上学，还有到法国的旅途中发生了什么等。这些问题单独问的话是没法判断难民是否是未成年人的，不过将所有的问题综合起来的话（按照法国政府有关当局的观点），还是基本能够判断出来的。当然无论如何，理论和实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难民身心受到伤害可能会导致他不敢说实话，或者回忆混乱，这样肯定会影响到测试的结果。

在法国 MIE 的接待非常困难，在其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加来丛林的难

^① 临时安置许可：司法决定是否给孩子提供住处。临时安置许可期限一年，可延长。

民问题”：加来丛林位于加来、科凯勒和桑加特之间，在英法海底隧道附近。加来丛林中有来自阿富汗、达尔富尔、叙利亚、伊拉克和厄立特里亚等地的大量难民。这些难民之中有不少按照法律需要被保护的未成年难民，他们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面临严重的食品短缺和医疗救助问题。在巴黎的街道上就能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没有被妥善安置的未成年难民。再比如，2017年2月12日在里昂，20多个MIE被安置在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宿舍里（自来水不符合卫生标准、没有床单等），缺乏起码的安全生活条件。当这些MIE向负责接待他们的机构提出抗议时，却被警察予以制止。虽然这一状况后来得到改善，但这件事还是表现出某些地区在接待MIE上所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地区的MIE数量过多会导致安置方面的种种困难。不过人们有理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导致不安全的问题呢？如果一个人不被允许自己找地方住，不被允许去工作，并且政府又不能给他提供居住的地方，那么他在法国又怎么能够生存下来？所以未成年难民犯罪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于MIE自身，同样，地方政府在接待安置MIE时所存在的诸多不足也是其原因。

追根到底，出现接待安置种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源于MIE在法国全国的分散状态和政府援救处置的迟钝。这种迟钝也会导致接下来的问题：虽然MIE被接受并且享受国家的接待福利（包括教育），但有时候因为他们到了18岁，所以中学还没毕业就被驱逐出境。虽然法律规定岁数较大点的MIE可以被保护到21岁，不过法律的这项条款是由地方当局来决定是否执行。法国安置MIE所暴露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接待系统的“不善良”，而是说该系统需要进一步改善。有的问题不全是接待系统所造成的，安置难民成功或者失败是由许多条件共同决定的，比如说问题可能来自语言交流的障碍等。

从根本上来说，最终实现MIE的成功安置，必须达到适应当地文化的两个条件：第一，国家能够切实保护并且尽可能培养MIE适应在法国的学习与生活的能力；第二，MIE需要积极主动地融入法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虽然MIE在抵达法国前已经历过许多苦难，但到达法国后面对的全新环境仍然存在着许多挑战。他们要接受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有时候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母国文化为了能够适应迁移国的文化）。改变思维方式是不易的，有时候这相当于为了变成另一个国家的人而不得不抛弃原来的自己。

当然，法国接待MIE也有成功的案例：

——纳加马（Nanjman）：19岁，来自阿富汗，2010年被接受为避难者。

纳加马来到法国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他说：“我爸爸在我们国家当时是政府官员，我觉得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读书做评论，这样的经历让我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他抵达法国的时候正碰上法国学校学期的期末，由于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上学，当时有点失望。但下一学年开始后他就进入了接待外国学生的三年级班级（着重语言的学习）。“我跟老师和同学们说我想成为医生，老师说我现在不行，因为我首先需要选短期语言学习。结果我还是上了高中，我想通过高考”^①。后来纳加马读了理科专业。

^① Nanjman, *Le cahier social*, N°28, 2011年2月。

——朗斯·阿鲁纳 (Lance Harouna) 和戴维 (David): 来自马里, 接受 LE DAMIÉ 培训。

阿鲁纳到法国的时候已经 16 岁了, 当时一句法语都不会说。“一开始情况很糟糕, 不过在克莱蒙费朗的寄养家庭中和 LE DAMIÉ (Dispositif d'Accueil des Mineurs Isolés Etrangers: 负责接待 MIE 的机构) 的帮助下, 我很快就学会了法语”。像他一样的 31 个 MIE (16 到 18 岁), 被 LE DAMIÉ 照顾并且坚持学习法语, 随后顺利地接受了职业教育。戴维, Le DAMIÉ 的另一个学生还补充道: “我在面包店, 鱼肉店和在销售岗位实习过。最后我选择了面包店, 并且我很快就找到了技术培训。技术培训让我跟雇主聊天, 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增加了自信心。我所成就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 LE DAMIÉ。”^①

——朗吉斯国际职业学校: 13 个 MIE 经过技术培训结业。

“我们原来想给 MIE 创造短期的学习过程, 以便让他们很快就会得到工作机会。他们的情况十分尴尬, 为了能工作就必须有证件, 而没有证件根本不能工作。我们想帮助他们在成年之前就找到工作, 这也是他们的希望。”^② 克里斯蒂娜·布伊松 (Christine Buisson), ASE 里“Réagir”项目的组长这样说, 她还表示, 项目成功的话会继续给 MIE 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结语: MIE 给法国带来的影响

概括来说, 法国政府接待 MIE 的方式行动缓慢, 手续繁杂, 效果低下, 各个部门还存在配合不协调等问题。这一状况根本不适应那些刚来到法国, 大部分不会说一句法语的 MIE。接待过程中的问题导致 MIE (或者年龄稍大一点的难民) 在一定时间内只能靠自己来维系生存, 有时候为了活下去还会犯罪。没有安全感就很容易刺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的发生发展, 这些恐惧会被一些极端的右翼政党加以利用以增强自己的存在感。

事实上, 法国政府和有关机构在接待和安置 MIE 的问题上, 如果能够抛弃片面和歧视, 是可以做更多工作的。例如强化相关职能机构的协调, 在甄别过程中尽可能多提供一些生活帮助以及提高效率缩短时间等。再如可以创设家庭寄养的方式来接待 MIE, 并且尽量把 MIE 分散安排在法国不同地区的家庭里, 这样虽然管理会难一点, 但会减少甚至消除 MIE 睡在马路边的危险, 特别是防止他们为了生存而走向犯罪的可能。总之, 如果能从入境之时就给 MIE 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和不适应感, 就能增强他们的安全感, 随之也更容易融入法国社会。

近几年, 围绕难民问题在法国社会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内容是社会治安和挤占资源。从经济角度来看, 安置难民政府当然要付出代价, 然而对生育率一直低下的法国来讲, 这些未成年难民未尝不能被视作潜在的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 法国数百年来一直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精神, 面对这些苦难中的 MIE, 无论从履行国际公约的义

^① Lance Harouna and David, *Amnesty International*, N°17, 2017 年 2 月。

^② Christine Buiss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N°17, 2017 年 2 月。

务还是从基本的人道主义角度来讲，法国都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安置好他们的任务。对于 MIE 来说，不管他们身份如何，不管他们来自何处，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享有基本的人权，这是毫无争议的。

对法国来说，MIE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MIE 来到法国的长远影响，在笔者看来最主要的是改变本地人思维，推进跨文化交流。成功适应法国社会的 MIE 是两个国家的文化——母国和接待国文化的载体，他们是跨文化交流的使者。本地人如果不拒绝接触 MIE，也会了解很多异域文化的内涵，获得别国民族文化的真实信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人相处，能够让彼此的思维更加开放、视野更加开阔，这对于人类文明来说，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许珂)

第八届中法跨文化研讨会综述

刘巍

2018年6月15日至16日上午，第八届中法跨文化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该研讨会围绕“文化·流动(Mobilit entre les cultures)”这一主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法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

本次研讨会设立了四大议题：中欧学生流动；中欧企业流动；中欧移民流动；梁宗岱与中欧文化。学生的流动通常对于接待国来说意味着自身具有吸引力，这种流动对于学生、学校、来源国以及接待国都有利。跨国公司通常在其内部有着非常多的流动（例如出差和职位提升等），但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也同样具有流动性（如国外设厂）。同样，人口的流动，特别在2015年欧洲经历过难民潮之后，成为各个文化不可回避的主题。2018年是梁宗岱先生诞辰115周年，这位文学和翻译巨匠的求知旅程丰富了其自身的思考，同时也丰富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梁先生的旅欧之路便是文化流动的最佳例证。在当今日益密切的流动中，特别在“一带一路”的重要背景下，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加强。法国总统马克龙于2018年1月访问中国，在法国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法方欢迎‘一带一路’倡议”。

15日上午，来自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Genevi ve ZARATE教授进行主旨演讲，题目为“通过对巴黎紧急接待中心里学校的人种志观察，看难民的反常流动”，她谈到了难民与法语的问题，并提出要学习当地的语言才能更好地融入。郑立华教授在“跨文化研究——以广外为例”的主旨演讲中，介绍了历届研讨会和社会实践调查项目，对跨文化研究提出了设想和期望。

15日下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张弛教授进行主旨讲座，题目为“现代性、流动与跨文化交际”，从全球化的历史，现代性的发展，以及民族主义的排外和人类共存等方面，强调了跨文化交际在当代的意义。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的Dominique Colomb教授发表了“流动与全球化”的讲座，以一家地方企业在全球化时代的成长历程为例，针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刘波教授以“各怀雄心的英国传教士和中国居士——李提摩太与杨文会之间一次南辕北辙的合作”为题发表了演讲，以历史上的一次东西